



转型中的中国文化及其对西方的回应(2)

汪涌豪 韦森

2009-6-29 14:18:31

来源：文汇报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转型中的中国文化及其对西方的回应(2)

——汪涌豪教授在圣彼得堡“金砖四国：稳健的进程”国际研讨会上的讲演

2 “知识共同体”的建立与中国文化的贡献

全球化应该是多元模式间的相互对待与作用，跨文化也应该是不同文化的多边互镜与视野交融，且它的目的是催生一种符合当代知识论公义的“知识共同体”。

正是意识到这一点，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致力于本国及本地区文化的保护与推展。“金砖四国”也同样，对文化的作用与影响给予着前所未有的重视，既注意国民经济中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也留心GDP之外的幸福指数、人文发展指数和平均受教育年龄等指标的变化。例如，印度在进入新千年之初就出台了《知识大国的社会转型战略》。俄罗斯在一年前也确立了“2020年前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其中特别提到要依靠俄罗斯文化特有的资源、独特的成果与传统，发展国民教育，开发人力资源等内容。

转型中的中国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与文化定位也非常重视。早在三年前，由文化部牵头，已着手进行《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课题研究。基于中国的国门早已打开，我们早已是跨文化的存在。要更好更快地发展，仅仅与自己的历史、文化对话远远不够，还要与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对话。如何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更有效地表达自己的主张，传扬自己的文化，成为中国学人普遍关注的问题。我们的主张是，如果真的承认这个地球上不同文明在价值上是同等的，那么，面对未来，全球化就应该是多元模式间的相互对待与作用，跨文化也应该是不同文化的多边互镜与视野交融，且它的目的是催生一种符合当代知识论公义的“知识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建成之初，东西方文化的交往，其输入输出的流量可能不尽均等，也不一定一下子就达到融会无间，但只要我们真正取一种多元包容的态度，和谐共生、杂语共存，渐渐地它们就会融合在一处。这就给东西方不同的文明一个机会，使它们可以为这个共同体提供各自的经验，并通过它，使自己的文化得到保持与发扬。其间，没有一种文化可以作为另一种文化绝对的评判尺度。这样行之日久，一旦纠纷产生，冲突纷起，利益的双方都退无可退，此时，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暂时搁置争议，从对方的传统中搜求，到各自的文化中体认，寻求在共同认可的“知识共同体”内求同存异，就有可能变“鸡同鸭讲”为柳暗花明。也就是说，有时候，一种文化的理解与认同，能使不同的利益体认识到彼此决策的内在动因和心理背景，从而学会易地而处、换位思考，进而有相互尊重的诚意和相忍相成的耐心。文

化就是这样，能以一种柔性的力量化解矛盾，消弭纷争，不仅缓释他人的猜疑与焦虑，也能帮人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金砖四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有各自不同的文明属性。我们都反对单极的世界与强权政治，主张国际关系应遵循互利共赢的原则，向更民主化的方向迈进。这是因为我们都确认，任何单向的独断与裁制都有违人与生俱来的自由创造与多样发展的天性，不符合多元包容的文明准则。我们各自的文化充满着这样的多元包容的优质元素，它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没有理由不好好发扬，并善加利用。

在这方面，中国文化的资源尤其可称丰富。譬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推崇“和为贵”、“和而不同”，讲究“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它所提倡的修己以敬，待物以恕，“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自律意识，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原则，都向人昭示了一种尊重差异、崇尚谦让的宽博仁厚的文化品格。所以，前者为瑞士人胜雅律所肯定，在所著《一个当代西方人眼中的孔子》中，他称这样的自律精神很“值得西方人学习”；后者更是早就受到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等人的推崇，或以为在法国大革命不久，其要义就被吸收到著名的人权宣言中，甚至被写入宪法。但它在1993年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上，被公推为所有宗教都必须遵守并照奉的两个黄金规则之一，却是不争的事实。更难能可贵的还不仅于此；中国的先哲还进一步提出，即使是己所欲，也不应强施于人，这是中国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通过鲁国国君以自己享用的太牢美酒厚待一只偶尔闯入的小鸟，最后致其不能适应而死的寓言告诉人们的道理。如果说，孔子说出的是一种伟大的思想，那么庄子说出的是一种更伟大的思想。这就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和交往之道。也正基于此，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酷爱和平。西方人曾经称中国是一个“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其实真正的原因无关骄傲，而在文化。

至于在重新定义人类的生存状况，考虑人的生存意义与方式方面，中国文化也有许多可资启示的深刻思想。譬如，作为后发国家，“金砖四国”的经济发展相对依赖资源环境，为此，各国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连带其发展的模式也频频遭到世人的质疑。当此环境问题成为全球热点，中国自周秦以来完备的虞衡制度和《伐崇令》、《田律》等制度法令的设计颁布，特别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天人合一、厚德载物思想，以及所内含的非人类中心的生态意识，就可以给人以深刻的警示。这种思想与意识同样贯穿在儒道两家的论述中，尤其是道家，近乎自然的绝对崇拜者。它主张“与天为徒”，反对物我两分，所强调的是“道法自然”的生态整体思想；主张“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反对天人相胜，所推崇的是不以人灭天的生态和谐思想；主张“无物不可”，“不同同之谓大”，“有万不同之谓富”，反对偏执功利，所倡扬的是万物平等的生态伦理思想；主张“纯白”生神，反对机事机心，所坚持的是“吾非不知羞而不为”的生态技术思想，这些都暗含着精深的救世意味。受此影响，以后道教由“齐同万物”的观念，发展出“三才相盗”的自然观，强调天地、万物与人各循其道，互资利用。这种思想连同“德及微命”的观念，人欲自安当先安天地的主张，以及无烧山破石折花伤枝，凡射飞逐走，发蛰惊栖，填穴覆巢，伤胎破卵，均是罪过的认识，无不体现出中国文化对自然的一贯尊重，对不能循理因势，以火燬井、以淮灌山这类蠢事的一贯反对。

正是体认到这一点，上世纪以来，“世界宗教与环境联盟”与“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会议”不止一次地邀请中国道教协会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就生态问题展开讨论。显然，这种思想，连同《周易》、《管子》和孟、荀等人的相关论述，完全可用为中国人构建环境伦理，滋养生态文明的精神资源。检讨以往陈旧的经济方式，对“金砖四国”来说，它既应该包括对过分依赖外贸出口的单一经济的反思，也应该包括遵循先人的教导，对无节制的、特别是高能耗低效率的生产方式的摒弃。当然，这样的思想也值得整个世界反思与记取，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人对自然过度征服所造成的生态灾难，多得使西方世界不得不对其所谓“人是万物的尺度”的经典思想重作审视。与这种思想相比，

中国文化对改造自然过程中人的自律的强调，显然具有特别的意义。它能在后现代的当下，拉近西方世界与中国的距离，使他们很自然地想到自己文化中兴起的关于大地情怀和诗意栖居的论说。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Copyright © 2005 www.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